

“天有求绎”与“地法九宫”

——西周雒邑规划的“象天法地”

徐 斌

(故宫博物院 宫廷历史部,北京 100009)

摘要: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仰观俯察”精神,投射于城市规划领域,形成了独特的“象天法地”传统。以西周都城雒邑规划为例,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为基础,探讨“象天法地”规划思想和方法的成型及其在雒邑营建中的表现。雒邑规划综合运用“象天”和“法地”的手法,树立了中国古代城市“象天法地”规划的典范,影响深远。以雒邑规划为出发点,可以为商代都城和西汉长安的规划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路。

关键词:城市规划;都城规划;西周雒邑;象天法地

中图分类号:TU9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2)06-0044-08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仰观俯察”精神,投射于城市规划领域,形成了城市规划史上独特的“象天法地”传统。鉴于古代天文学在政治和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历代文献关于古代城市“象天法地”规划的记载非常可观,从中可以梳理出一条发展和变化的脉络。概括而言,“象天法地”规划萌发于商、周,兴盛于秦、汉,成熟于隋、唐,集大成于元、明、清。本文将回到西周初年这个关键节点,探讨“象天法地”规划理论的成型及其在都城雒邑营建中的表现。具体来说,讨论雒邑规划的四个问题:(1)规划思想:武王对雒邑规划的构想是“依天室,定天保”,“天室”究竟是天文要素还是地理要素?(2)规划选址:雒邑选址有“土中”“南望过于三涂,北望过于岳,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及“洛汭”等说,其对应的地理范围究竟如何?(3)规划时间:雒邑规划从“二月乙未”持续到“三月甲子”,其中又以“三月庚戌”至“三月甲寅”为期五天的“攻位”环节最为关键,选择上述时间开展都城规划有何特殊含义?(4)规划布局:“攻位”的具体内容为“立城郭”“制郊甸”“分县郡”“居众民”“设丘兆”“建大社”“位五宫”“定建筑”,大致对应今日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内容,召公采取了何种空间组织模式得以在短期内实现多层次的空间

规划?对上述问题的探索,将揭示雒邑规划的“象天法地”思想蕴含及实施方法。

一、相关材料

有关西周雒邑的营建,在青铜器铭文和历史文献中有着丰富的记载。材料中的“洛邑”“洛师”“大邑”“新邑”“新京”“新邑洛”“成周”“洛”等均指“雒邑”^[1]。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上刻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又民。’”证实了定都雒邑的历史事实(图1)。



图1 何尊铭文拓片^{[2][3]}

收稿日期:2022-11-10

作者简介:徐 斌(1985-),女,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E-mail:biu.xu724@foxmail.com

历史文献则涉及《尚书》“召诰”“洛诰”，《逸周书》“度邑解”“作雒解”“明堂解”，以及《史记》“周本纪”“鲁周公世家”等篇。现分三类辑录如下。

第一类，记载了雒邑营建的背景和建都思想，如《史记·周本纪》：“武王征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3]122-133}又如《史记·鲁周公世家》：“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3]1515-1519}以及《逸周书·度邑解》：“王曰：‘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室，其有宪命，求兹无远虑。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我北望过于有岳，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4]479-483}

第二类，记载了雒邑营建的步骤和召公、周公的工作内容，如《尚书·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5]285}又如《尚书·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伋来以图及献卜。’”^{[5]294}

第三类，记载了雒邑营建的空间布局模式，如《逸周书·作雒解》：“周公敬念于后，曰：‘……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二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邙山……大县立城，方

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乃设丘兆于南郊……乃建大社于国中……乃位五官：太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4]524-5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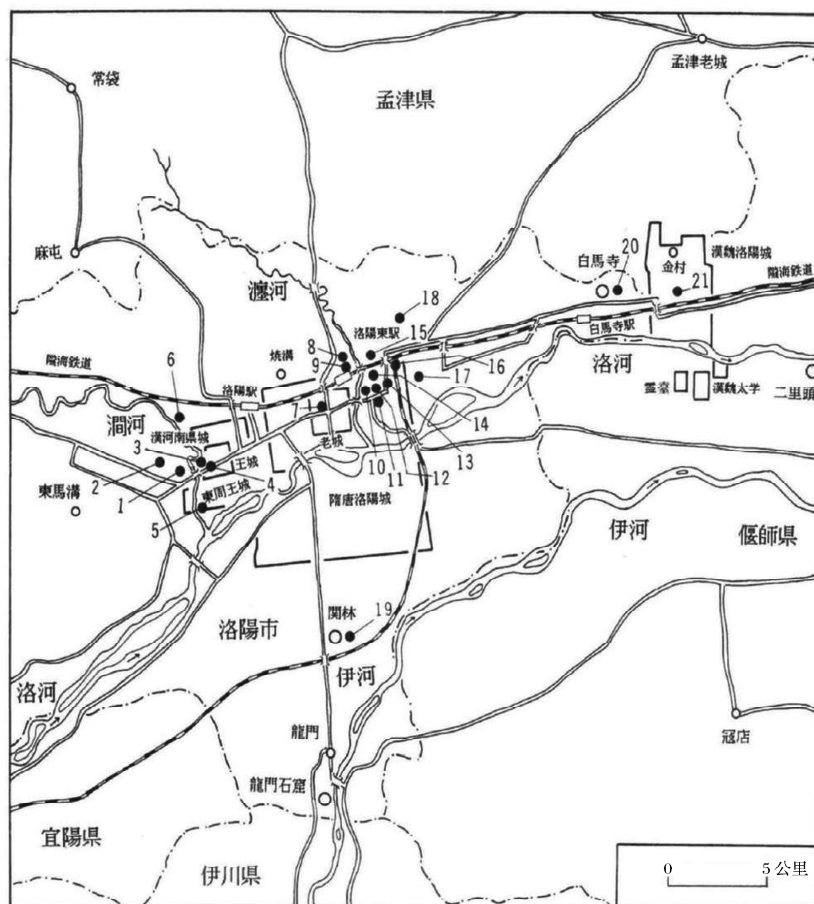
从上述材料来看，雒邑营建主要涉及四个关键人物：(1)武王：提出定都雒邑的构想，划定都城的大致范围；(2)成王：武王之子，继承武王遗愿，是雒邑营建时期的执政者；(3)召公：武王至成王时期的重要辅臣，时任太保，负责雒邑营建中的“卜宅”“经营”“攻位”等步骤；(4)周公：武王之弟，同样是武王至成王时期的重要辅臣，负责雒邑营建中的“观邑”“郊祀”“社祀”“丕作”等步骤。

二、规划选址

虽然雒邑遗址在考古中尚无定论，但多年的历史地理和考古研究仍然积累了不少成果，厘清了西周时期伊水、洛水、涧水、瀍水等主要河流的走向^[6]，洛阳地区古代城址的空间演变^[7]，以及西周遗址的总体分布等^[8]，为进一步揭示西周雒邑的位置和布局提供了有力线索(图2)。

依据文献，雒邑选址在空间上分为三个圈层：(1)最大的圈层，是国土的中心。《逸周书·作雒解》记载“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史记·周本纪》记载“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都是指将都城置于“天下之中”。(2)中间的圈层，是都城的腹地。在《史记·周本纪》中由武王拟定，“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逸周书·度邑解》也有类似表述。即南至三涂、北至岳鄙、西至天室的三山界定的范围，其间有河水、洛水、伊水等流经。(3)最小的圈层，是都城的边界。从《尚书·洛诰》记载的周公卜地来看，“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雒邑应占据涧水东、瀍水西以及瀍水东的两个地块；从《逸周书·作雒解》“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邙山”和《尚书·召诰》“攻位于洛汭”来看，雒邑选址还应靠近洛水。

综上，雒邑选址应在洛水、涧水、瀍水交汇的附近，这与前述洛阳地区西周遗址的分布特征也相吻合(图3)。



1. 西干沟遗址 2. 涧滨西周墓 3. T203-M3号墓 4. 中州路西周墓 5. 瞿家屯遗址 6. 五女冢西周墓
7. 老城西周车马坑 8. 庞家沟西周墓地 9. 北窑铸铜遗址·西周墓 10. 西周窑址 11. 泰山庙遗址
12. 东大寺遗址·林业学校车马坑 13. 东关遗址 14. 下瑶村遗址 15. 摆驾路口遗址
16. 焦枝线甲骨出土遗址 17. 东郊M13号墓 18. 交通部西周墓地 19. 关林遗址 20. 白马寺西周墓
21. 汉魏洛陽城西周城郭

图2 洛阳地区西周时代遗址分布^{[8]5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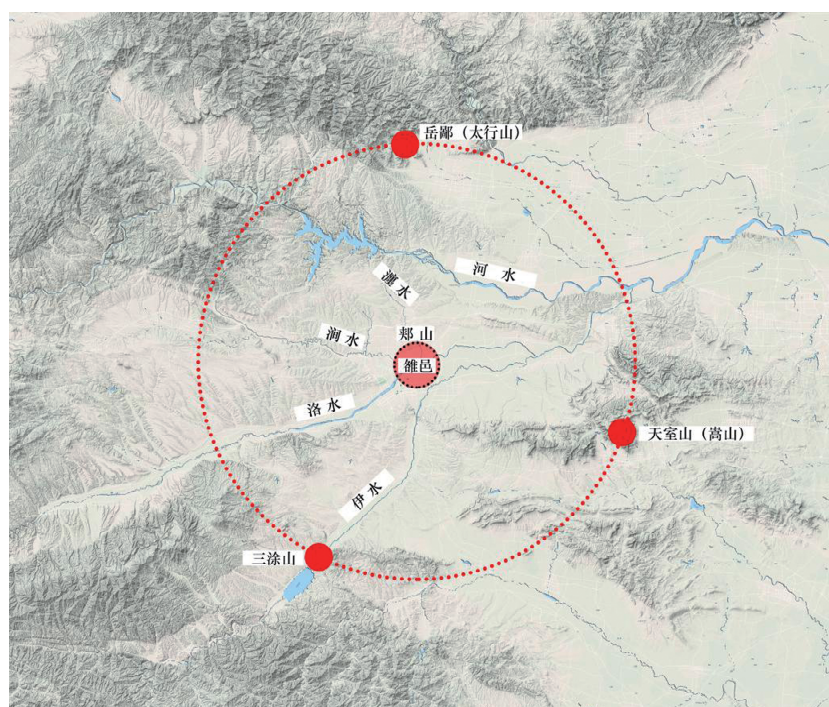


图3 雒邑选址的地理要素

三、规划时间

仔细阅读《尚书·召诰》,“攻位”介于“召公卜宅”和“周公祭祀”之间,其内容应包括都城选址与主要功能区布局,正是今日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9]。

“攻位”从“三月庚戌”持续到“三月甲寅”,才宣告“位成”。那么,“攻位”一共持续了多少天?又为什么选择这几天呢?鉴于《尚书·召诰》的记载非常翔实,下文即对照《西周纪年》等研究,还原《尚书·召诰》所涉及的具体日期(表1)。

表1 雒邑规划时间复原

原文	释文	西周历	儒略历	相关活动
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既望:每月16日 乙未:第32	2.21	3.16	惟太保(即召公)先周公相宅
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	丙午:第43 朏:每月初三	3.3	3.27	无
越三日戊申	戊申:第45	3.5	3.29	太保(召公)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
越三日庚戌	庚戌:第47	3.7	3.31	太保(召公)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越五日甲寅	甲寅:第51	3.11	4.4	位成
若翼日乙卯	翼日:明日 乙卯:第52	3.12	4.5	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
越三日丁巳	丁巳:第54	3.14	4.7	(周公)用牲于郊,牛二
越翼日戊午	戊午:第55	3.15	4.8	(周公)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越七日甲子	甲子:第1	3.21	4.14	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从表1可以看到,雒邑规划从西周历3月5日(戊申)召公到达雒邑开始,一直持续到3月21日(甲子)周公率殷遗民营建为止,共计17日。其中3月7日(庚戌)至11日(甲寅)为“攻位”,耗时5天。刘启益《西周纪年》的研究将雒邑营建时间定在成王七年,对应公元前1062年^[10]。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的复原研究显示,公元前1062年的春分点在3月31日23时20分,当日也为庚戌日^[11]。虽然西周历法的研究尚存争议,但“攻位”起始日极有可能就是春分日,因为前后两个庚戌日各相差60天,不可能同时满足“三月”的条件。将“攻位”时间选择在春分日的事实,揭示出西周雒邑规划“象天法地”的可能。

《逸周书·度邑解》有“其惟依天室,其有宪命,求兹无远虑”的记载,说明雒邑营建的背后,存在“依天室”——“有宪命”——“无远虑”的逻辑,即将都城规划“依天室”与“得天命”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重新审视“天室”的含义^[12]。在上述引文之后,紧接着是“天有求绎,相我不难”一句。目前通行的解释是:“绎”通“恧”,即“悦”,取

“高兴”之义。但其实“绎”字还有另一个解释,即“灵星之尸”,见于《毛诗正义》:“丝衣,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也。’”^{[13]749}这一解释非常关键,说明在汉代以前,“绎”字还有天文学上的含义。灵星,即角宿的天田二星,位于黄道平面和赤道平面的交点,是春分日的代表。《史记·天官书》引《石氏星经》云:“左角为天田,右角为天门也。”^{[3]1297}天田是东方七宿组成的“东宫苍龙”的“左角”,《汉书·郊祀志》引张晏曰:“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辰见而祭之。”天田主农祥,汉高祖时曾“令天下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14]1211-1212}。

天文复原法在历史年代学的相关课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著名的“武王伐纣”问题。本文借鉴这一研究方法,使用天文复原软件Stellarium,以雒邑遗址所在的洛阳地区(N 34°41', E 112°27')为基准点,复原上文求得的“攻位”日春分点(前1062年3月31日23时20分)的历史天象。从图4可以看到,天田二星此时正位于南中天,与北极的连线构成一条南北方向的轴线。

表3 王郭、王城、大县之城、小县之城的规模

	王郭	王城	大县之城	小县之城
规模	方二十七里	方九里	方三里	方一里
比较		王郭的九分之一	王城的九分之一	大县之城的九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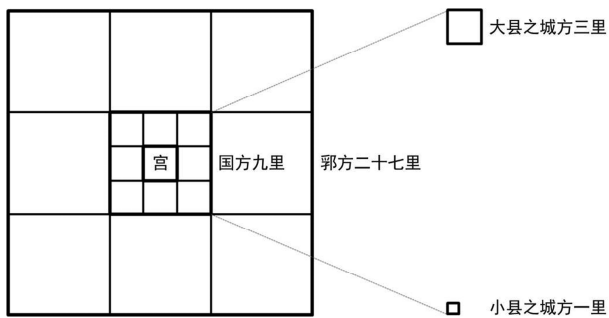


图5 《逸周书》和《考工记》所见周代城邑制度

在建筑层面,这种“九宫”模式依然存在。以“位五官”中的“明堂”为例,《逸周书·明堂解》记载:“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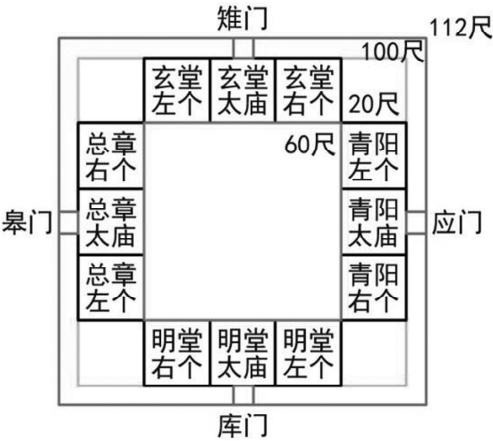


图6 《逸周书·明堂解》复原平面与东周漆画中的明堂
(来源:右图文献[20]53)

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阶广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户高八尺,广四尺。东应门,南库门,西皋门,北雉门。东方曰青阳,南方曰明堂,西方曰总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庙。左为左介(个),右为右介(个)。”^{[4]710-716}

文献所载的宗周明堂,时代早于雒邑明堂,可作为雒邑明堂的设计参考。据此数据复原的西周明堂平面,与考古出土的东周漆器上的明堂图案比较,吻合程度非常高^[20-21](图6)。



如图6所示,西周明堂的布局仍然是“九宫”模式的变体,这说明当时在国土、区域、城市、建筑等不同尺度,均使用一套相同的空间组织模式,即“九宫”之法。在《周礼》中,这套方法也被称为“形体之法”,有“遂人”“形方氏”等职官^{[19]223,489}。到了《汉书·艺文志》,则被称为“形法”,来源于“九州之势”^{[14]1775}。因此“九宫”模式的渊源,可追溯至“茫茫禹迹,画为九州”这一早期空间规划行为。传说“大禹治水”采用了“洛书”的空间模式:“《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其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22]165}而“洛书”的出现地,恰好位于雒邑选址的“洛汭”:“仓颉为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23]486}作为历史上“九宫”模式的诞生地,雒邑规划极有可能受到地方传统的影响。这套“九宫”之法,在西周时期进一步衍生,成为名副其实的“地

法”,深刻影响了城市、建筑等领域,形成了一整套覆盖从天下到国家、从国家到城市、从城市到建筑等不同尺度的空间规划设计模式。

五、规划复原

结合前述洛阳地区山水格局和西周遗址的分布,做一大胆猜测,雒邑选址应在洛水、涧水、瀍水交汇的附近,都城轴线朝南,空间布局为内外城嵌套的形式,其内城“方九里”,外城“方二十七里”。按照西周一里约为480米推算^{[24]68-72},西周雒邑的轴线很可能与隋唐洛阳的轴线位置重合,直指南面的伊阙。相应地,雒邑内城大致位于隋唐洛阳城的宫城和皇城范围,外城南面与隋唐洛阳外城南墙重合。依此划定的雒邑范围,基本涵盖了洛阳地区的西周遗址,但究竟情况如何,还有待考古发掘工作

的进一步开展。

六、结 语

以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为基础,揭示西周雒邑规划的“象天法地”思想蕴含。研究显示,雒邑的“象天法地”规划,早在武王时期就已拟定基本原则,但直到成王时期才真正实施。第一阶段由太保召公主持,分为相宅、卜宅、攻位三步。其核心步骤是“攻位”,耗时5天,共两部分内容:一是“拟定中轴线”;二是“组织空间布局”。在“拟定中轴线”环节,运用“象天”规划手法,选取春分点这一特殊时刻星象,以“绎星”(角宿天田二星)和北极的连线,定下都城中轴线。在“组织空间布局”环节,采取“九宫”模式,划分城、郭范围,制定郡、县之城的规模,确定丘兆、大社、太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等核心建筑的位置和形制。“九宫”模式上可追溯至“洛书”,是“大禹治水”后划分“九州”的模式,被后世奉为“形法”,是古代空间组织的原型。雒邑规划吸纳了这一模式,从“法地”角度,对国土、区域、都城、建筑等不同空间采取统一的划分方式,形成“九宫嵌套”的空间体系。召公的工作完成后,由周公主持占卜、郊社祭祀和具体的营建活动。

贺业钜对《考工记》“匠人营国”制度的研究显示,西周初期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制度形成的时代。本研究进一步揭示出西周雒邑的选址和布局还蕴含了“象天法地”特征,可以推测,这一时期同样也是中国古代“象天法地”规划思想和方法的确立时期。雒邑规划以特定时刻天象拟定都城中轴线位置,以“九宫”模式组织城邑空间布局,树立了中国古代都城“象天法地”规划的典范,在秦咸阳、西汉长安、东汉雒阳、隋大兴—唐长安、隋唐洛阳,元大都,明清北京的规划中均有所继承和创新。

西周雒邑的“象天法地”规划手法,相对来说已经成型。以雒邑为出发点,可进一步追溯“象天法地”规划的早期案例。《尚书·尧典》记载了帝尧时期对“四仲中星”鸟、火、虚、昂的观测;《左传》《国语》有“辰为商星、参为晋星”“商主大火”等记载。商人同时还是营城高手,目前考古认定的郑州、偃师、洹北三座商城,大致覆盖了公元前1600—1300年,都非常规整且存在南偏西方向的中轴线。这是否与当时“商星”的位置相关,是否与西周雒邑取“绎星”与北极连线的方法相同,值得进一步探讨。

西汉长安的规划思想被张衡精辟地总结为“览秦制、跨周法”,何为“秦制”、何为“周法”?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和相关研究,都城咸阳规划主要表现为“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的“象天”特征和“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的“法地”特征。西周雒邑和秦咸阳规划所共有的“象天法地”蕴含,可以为解读西汉长安的规划思想和空间布局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路。

参 考 文 献

- [1] 钟春晖. 天下观念与周初之建都雒邑[C]//清华大学历史系. 社会·经济·观念史视野中的古代中国. 北京: 国际青年学术会议暨第二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 2010:367—377.
- [2] 段德新. 国宝何尊与“中国”[J]. 文博, 2005(6):30—31.
- [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4] 黄怀信, 张懋镠, 田旭东. 逸周书汇校集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5] 李民, 王健. 尚书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6] 叶万松, 张剑, 李德方. 西周洛邑城址考[J]. 华夏考古, 1991(2):70—76.
- [7] 李久昌. 国家、空间与社会: 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7.
- [8] 饭岛武次. 洛阳西周时代的遗址与成周、王城[J]. 胡明明, 译. 考古学研究, 2003:557—571.
- [9] 郭璐. 中国早期都邑规划中的“位”[J]. 城市规划, 2021(12):77—83.
- [10] 刘启益. 西周纪年[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 [11] 张培瑜. 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1997.
- [12] 林沄. 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J]. 史学集刊, 1993(3):24—29.
- [13] 毛公, 郑玄, 孔颖达. 毛诗正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14]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15] 范晔. 后汉书[M]. 李贤, 等,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6] 程俊英. 诗经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17] 韦昭. 国语[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18] 闻人军. 考工记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19] 杨天宇. 周礼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20] 曹春萍. “四阿重屋”探考[J]. 华中建筑, 1996(1): 50-55.
- [21] 杨鸿勋. 明堂泛论——明堂的考古学研究[C]//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 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所. 营造第一辑. 北京: 第一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 1998: 3-96.
- [22] 孔安国, 孔颖达. 尚书正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23] 王国维. 水经注校[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 [24] 丘光明, 邱隆, 杨平. 中国科学技术史: 度量衡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Modeling Heaven and Earth”

——The idea in the planning of Luoyi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XU Bin

(Palace History Department,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looking up in the sky and looking down at the ground”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projects a unique tradition of “modeling heaven and earth” in the area of ancient city planning. Based on the planning of Luoyi,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eological materials, the paper studies the formation of the idea and method of “modeling the heaven and earth” in plannin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uoyi city. The comprehensive use of the techniques in Luoyi planning sets up a model of ancient Chinese city planning of “modeling heaven and earth” and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The research of Luoyi planning may also provide a broader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the capital cities of the Shang Dynasty and the Chang’an City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Key words: urban planning; capital city planning; Luoyi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modeling heaven and earth

【编辑 高婉炯】

(上接第29页)

An Operation Method: the Logical Structure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YU Hui

(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in all courses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should focus on life awareness, local concepts and cooperative spirit. Fundamentall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is a tool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urriculum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is constantly explored and modernized. The times task to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the necessity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curriculum, and the times demand of the mainstream values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are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to become the metho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focus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interaction between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all-round human develop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aims to promote people to find the truth, attract people to goodness and make people more beautiful, which form the mechanism struct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as a method. This approach becomes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erves as the key to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to respect the growing rules of students and meet their needs, the important tool to keep up with times by using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to improve the driving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chanism structure; practice orientation

【编辑 王思齐】